

Y734/28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舞 台 名 流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刘文新

舞 台 名 流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

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

合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中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7/32 字数240,000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7-01470-8/K·132 定价：3.90元

我的艺术生涯

刘相如



刘相如 笔名沙萍、晋子。

1922年生，山西省洪洞县赵城堤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团宣传员，战士剧社演员、分队长、创作员，辽东省安东广播电台编辑室主任，白山艺术学校戏剧系主任，白山文工团团长，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部副教授，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市政协常委，市中苏友好协会副

会长，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主要创作有《死也不说》、《信不得》、《钢铁人》、《在新事物面前》等剧本。导演的话剧有《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伏契克》、《兴安岭战歌》；评剧《白蛇传》、《陈妙嫦》；歌剧《海霞》等。

一、梦的破灭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难忘的家乡，而每当回忆这些的时候，首先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家乡的那条汾河。母亲生养了我，使我从母体内一个混沌的世界，降生到了人间；而汾河，用它独特的性格和它两岸固有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民间艺术，给了我童年时代的向往和梦。

1922年的7月，我降生在山西省赵城县汾河岸畔的堤村。

堤村是一个有五百多户人家的大村，离县城号称五里，间隔一条汾河，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是山西有名的晋南产麦区。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哥、二哥是父亲的前妻所生；我的生母，是由于丈夫病死而后嫁给我父亲的，她生了我和两个弟弟。我的父亲是过继给一个本家爷爷的，他留给父亲的是几间青砖瓦房和几亩水浇地。这个家庭可以使我吃饱穿暖，但是，它缺少温暖和爱。当然，母亲是爱我的。因此，我对这个家庭的爱，可以说是由于对母亲的爱而产生的。但是，母亲是不幸的，她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最后给予她的是痛苦、失望，作为一个儿子来说，我深感内疚。

这个家中的一切，是与一家之长——父亲分不开的。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文化、封建思想很浓厚的人，他是这个家的权威。他要按照他的意志、思想、爱好、追求来统治这个家，任何人不得违抗。他一生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发财；二是希望儿子做官。前一条寄托于土地，后一条寄托在我们兄弟们身上。

希望使他天亮即起，日落而归，终日忙农活。他一生不沾烟、不沾酒，勤俭治家，过年连个鞭炮也舍不得买。土地不多，

一年所收的粮除一家人吃穿之外，所剩无几，还要供给儿子们的学费。他最大的希望是靠儿子念好书升官发财，这种思想来源于戏文中：“十年寒窗苦用心，来年金榜把名提”的状元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给了父亲深刻地影响。遗憾的是大儿子连小学都没念完，就哭着不念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幻想又落到老二身上了，可是二哥初中毕业后结了婚，书难以再念下去，就跑到太原兵工厂当工人，幻想又落空了；轮到三儿子我的身上，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儿子给予他的也是失望。总之，父亲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实现他愿望。

父亲要按照他的模式来造就他的儿子，因而特别严管。他在村里为人正直、性格倔强、宁折不弯，是众人皆知的。在家里，凡是违犯了他的主张，不管是谁，都少不了挨一顿打。父亲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无人敢说他一个“不”字。我从父亲身上没有感受到温暖的爱，只是领略到了一个家长的权威和严格的管教。

我所疼所爱的是母亲。她是一个山村里长大的女人，贤惠、善良、慈爱，是一个中国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嫁给父亲后，没有得到真正的爱和幸福。大哥和二哥非她所生，结婚之后都分居过活，她不可能沾到他（她）们什么光。父亲整天忙那几亩地，我和两个弟弟都还小，家务活都落在母亲身上。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可是她一不看大夫、二不吃药，拖着个病身子，一日做三餐，还得为一家人纺线、织布、缝衣，我体会母亲的劳累，了解她的孤单，我知道，在这个家庭中，惟有我是最理解母亲的人，最爱母亲的人，最心疼母亲的人；而母亲也是最心疼我，最爱我的人。她把希望寄托于我。

有一天中午放学时，母亲在大门外和几个邻居正在请一个拉

骆骆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母亲“日后要靠三儿子”（我排行老三），算命先生说到母亲心眼里去了。是呀，她不靠亲生儿子靠谁呢？！

母亲疼我，我疼母亲。每天放学回来，一进大门首先望窗户，若是窗户玻璃后面有母亲影子，“啊，她今天肚子没有疼”，顿时我高兴起来；倘若望不见她，心里忐忑不安：“母亲又犯了病吧？！”心里马上充满了忧郁。晚上，在油灯下，母亲犯胃病，我经常跪在她身边，用手轻轻地为母亲揉胃。母亲望着我，瘦黄的脸上，滚出了眼泪。我望着母亲，也不住地流眼泪，此时此景，感到母亲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我的快乐，似乎只有在学校。我第一次上学是个私塾馆，老师是本家的刘月生叔叔，教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校址是在一私人家的两间房子，中间摆着孔夫子的牌位和香炉，两铺大炕，老师一铺，学生一铺。老师上午种地，下午来校，到校后他便躺在炕上，让我们背书。我们大家找机会应付他，趁他睡熟，背书的学生从第一句跳到最后一句，有时被他发现了，就得挨一顿手板或者是“吃糖爪儿”（用二指和三指弯曲的背击学生的后脑勺）。这个老师心狠手重，我的后脑勺曾被击肿了好几个包。有一次我母亲还找到了他的妻子表示了不满。以后我到村里办的小学，老师是一位秀才，教的还是那一套。父亲为了使我多念点书，又送我到天主教的学堂念了几天。在这里，不管你信不信教，每天总得跪两遍，听教徒祷告。以后，我家附近的火神庙成立了念现代课文的学校，我又转入这个学校。

在学校里，我非常快活，因为看不见父亲的威严面孔，听不

见母亲的呻吟。我成了学校里最活跃的人物了，捉迷藏、闹秧歌，我是积极的一个。有一次中午老师没有来，我领着几个同学在教室里闹秧歌，扭得正欢，忽然“哗”的一下子，人都跑了。我回头一看，坏了，老师已堵住了门口，我急忙钻到桌子下面，可是脚步声一步步逼近了我，我想岂能坐守待毙，于是钻出桌子跑到院子里。老师约有七十多岁，白胡子，长手杖，追出教室，这位老秀才气得呼呼喘气，命令他的孙子：“狗狗，给我抱住！”他抱住了我，自然又挨了一顿打。

是的，我爱秧歌。每当旧历二月初一，全县的秧歌都要到赵城表演，一清早街道两面的铺子全关门了，门前都摆好长条凳子，供观赏者坐。啊！一队一队的秧歌，一只一只的旱船，一排又一排的高跷，他们扭着唱着；还有那气派的“威风”（由十人组成相等的两排男青年，各执铜锣一面和两端系着红绸的锣槌，后面是四人抬着两面大鼓，还有一对钹，人们都用白羊肚子手巾裹头，戴茶色的眼镜，鬓插一只花），真是既俏皮，又浪漫。十里长街万人拥挤，锣鼓喧天，响彻全城，这壮观的场面令人陶醉，令人难忘。还有那正月十五，万紫千红的烟火，城乡群众，争相观看。尤其是惹人遐想的七月十五河灯，在这所谓“鬼节”的傍晚，寡妇们在哭丈夫，小伙子们在围观，真是别开生面的一个节目，你听这位寡妇的哭声：

“二婶子呀！你别拉，
让我把他爸哭几下（ha音）……

我到水缸里舀水去，
想起我那位受苦的他，
外圈骡子，里圈马，

拿起鞭子你舍不得打。”

她们用纯朴而散发香味的诗句，塑造了一个勤劳而善良的农民形象。充分地表现了汾河岸畔人民的才华。

我不但深爱着家乡的丰富民间艺术，也深爱这儿美好地自然风光：三月的桃花，五月的麦浪，七月的瓜香，还有那夏天因涨水而象烈马咆哮奔腾的汾河，河上勇敢的船夫，几乎是裸着身子，在混浊而又发狂的黄浪里掌舵，船在激浪里恐怖地颠簸着，他毫无惧色。

三月的桃花，七月的汾河，这一静一动，既抒情又浪漫，还有那既高昂又委婉缠绵的蒲州梆子，它高昂时可以使入回肠荡气，委婉缠绵又可以令人心酸泪下，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喜欢它，被它所迷住。

村里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唱几次戏，戏台是借用大庙里的台子，男人们在台下站着看，女人们坐在从家里抬来的桌子上看。每次戏唱三天，我至今还能背出那些名演员的名字；有些戏，还会唱几句。晋南人不会唱的人很少，男人们每当下地干活时都在唱。有一位叫裙才的男演员，专唱旦角，会踩高跷，他有一手绝活，可以使眼睛和耳朵里流血。他演一个受气的媳妇，婆婆狠毒，把媳妇吊在柱子上用锥子刺，他真的流血了；他的《挂画》很有名，踩着高跷在椅子背上挂画，做出许多惊人的动作，真令人叫绝。晋南人常说：“悞了收秋打夏，不要悞了裙才的《挂画》”。我看过现在蒲州梆子的《挂画》，基本上学的是他，但功夫还差。一句话，我被蒲州梆子迷住了，实在想做个演员。当然这是父亲所不允许的。我羡慕舞台上装神装鬼，自己快乐，也给人以快乐；也羡慕东走西闯的自由生活，这些都强烈地鼓舞了

我，吸引了我，戏台给了我美好的梦。

一年夏天，村里请来一个刚出师不久的娃娃班来唱戏。我们村里有关爷庙、火神庙……庙中都有戏台。这一次是在离我家很近的火神庙唱的。头一天唱的是《杀庙》，扮演韩琪的是个不大的娃娃。最后他放秦香莲娘三个逃走了，怕回府交不了差而上桌子自刎时，由于年小，拔出了刀上不去桌子，只好由检场人抱上去，坐好后再自刎。我看了感到又可笑又可爱，心似乎飞到台上去了。

我终于暗暗决定学戏，一天我与本家的一个叔伯哥哥说了我的秘密，要他领我去见班主，他答应了，偷偷领我到了班主的下处。他说明来意后，班主的两只猫眼象寻找什么似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从头到脚，端详了几回，终于开口了：“行，我收他。”我的心“扑咚”一下落底了！早就听说，学戏是很苦的，睡的是草铺，还要喷上水，吃的也不好，练功动辄就挨打，唱错一句，回到后台也饶不了。可是想不到自己也想入这个门。我哥哥问班主：“他能唱什么？”我很早就响往唱胡子生，在台上文文雅雅，大大方方，正正派派。可是老板说：“二花脸”。怪啊！让我学二花脸，作梦也没想到。二花脸咋咋呼呼，翻翻打打，我摇摇头和哥哥走了。路上我们商定：不让父亲知道，倘若事露，他挨骂，我挨打，这是起码的惩罚。我俩谁都不愿自找苦吃，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我只有安心读书了。村里成立了高小，夏天招生，父亲命我去考。作文题目是“村长的责任”，记得我的文章第一句就是“村长者，一村之长也。”这是秀才老师培养的一套，没有考上。

第二年的夏天，赵城县第一高小招生，我去考，心里没有

底，看榜时我不敢从前边看，而是从榜尾看起，不远处看见了我的名字。天哪！这回可考上了！我看了好几遍，千真万确是我的名字。我乐了，而那想登台唱戏的梦却破灭了。

二、起 点

家乡的庙何其多，在村里上小学是在庙里，想不到进城上学，校址依旧是在庙里。不同的是：这个庙在城东门 外，庙特大，房子多，后边还有一个大操场。这是赵城唯一的一所公办高小，学生有一百左右，老师有城里的，也有从外地请来的。课目有语文、算术、公民、地理等。我喜欢语文，讨厌数学；数学老师有点癩，对学生很严厉，不喜欢我。这里仍然保留打手板的旧习，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一个姓曹的同学在教室里闹口角，被他发现了，结果是受到打手板的处罚，由于我老是躲，他打的不过瘾，便朝我屁股上打了几板子，好在穿的是棉袍，所以不十分疼。

学校离我家五里路，每月伙食费约三元钱，父亲为了省钱，每月从家里背来磨好的面粉抵作伙食费。

在这里，我听到了过去在家乡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譬如说：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全是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现在的南面江西有共产党、红军；蒋介石发兵几十万不打日本打红军……；还有1932年1月28日，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遭到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反抗，由于蒋介石的出卖抗战失败了……这些革命史实教育了我，使我开了脑筋。我朦胧地感到了与自己命运的牵连，心里隐约出现一片不安，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思虑。

1934年我入校第一年的10月，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二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通过地下党的活动，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的。当然中国人谁也不愿把自己的国土让日本人占去，从心眼里认为共产党的话对，而蒋介石专打内战，对日本人一步一步退让、妥协，尤其是1935年11月日本人唆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更遭到每个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反对；“一二九”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巨大的海浪，强烈地波及到每个人的心灵。在这国难当头，天天遭受烈强欺凌的日子里生活，使我懂得了国家的安危与个人命运相关的道理，心中萌发了一种强烈地爱国思想。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怕共产党，也怕学生。学生主张抗日，在他们眼里就是和共产党一鼻孔里出气，他们的办法：一是抓，二是杀，爱国是没有自由的。警察和便衣特务常到学校监视我们，气得我们在屋子里偷偷骂警察是“黑狗”、“汉奸”。同学们背地里，总是传说着红军的各种消息。如1935年6月，学校地下党通过进步同学就偷偷告诉了我们红军为了迎接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决定北上抗日的消息，大家暗暗的高兴。可是国民党政府却害怕了，对我们进行了更严厉地监视。

1935年下半年，一件难以承受的打击，终于落在我的头上。一个礼拜六的上午，老师在上语文课，我低头看一本丁玲的小说，邻座的冯国楚同学也在看冰心的一本小说。我偶然抬头，看见一个陌生人在玻璃窗外偷看，我大吃一惊，立刻意识到“不好”！便把书放到桌子上。片刻，那个陌生人缓步而来，站到我的侧面，伸手把桌子上的书拿走了；然后，走到冯的桌前，也拿

走了他的书，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教室。

下课后，同学们谁也不敢问我一句，都噤若寒蝉。我更是六神无主，想起每月为我送面的父亲，想起了那位被算卦先生算定日后要靠三儿子的可怜母亲，一旦我被抓，他（她）们会怎么样？此刻，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一个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一个最弱小的人。

有人告诉我，学校派人去找校长了（校长家离学校有二十多里），结果如何，只好等到明天。黄昏，教语文的李老师把我俩叫到一间大会议室里，旁边还坐着不喜欢我的数学老师。李老师问我们看的是什么书？我俩回答“是丁玲和谢冰心的书”。李老师说：“别怕，走吧。”我心里象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得到老师的安抚，两条发软的腿，开始直起来了。不过，这一夜没有睡好，几个同学打抱不平，骂便衣警察“妈的，王八蛋，黑狗……”。

第二天早饭后，校长回来了，全校集合，校长要训话。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注视着校长的面孔，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戴一付金丝腿近视眼镜。院子里鸦雀无声，停顿了片刻，他开讲了：“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为什么要打我的饭碗子？！”我立刻觉得，我所敬仰的校长，一下子变得可怜了，是呀，我打了他的“饭碗”。校长停顿一下之后又说：“昨天晚上回来后，立刻跑到教育局长家里为你们求情。”我说：“请局长原谅，他们年纪都还小，不懂什么，还有半年就毕业，原谅他们吧，局长听了我的请求，才宽恕了你们……”阿弥陀佛，事情总算过去了，但给我上了一“课”，在我幼弱心灵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第二天，学校贴了一张警告全校的通知。

礼拜六下课后，我们外地学生都返回自己的家，听家人讲，政府发下来一支歌曲，命令村里的人都得会唱，如不会唱，每人罚大洋五角。歌子的内容还贴在村中最热闹的酒店墙上，意思是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动员老百姓反对共产党。家里没有人去学唱，村公所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阎锡山和蒋介石一样，一面抓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一面在欺骗人民，丑化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学生和人民坚决拥护。

1936年2月，消息传来，红军东渡黄河，社会不安，学校上课也受到影响，只好放假，我便回到了堤村。人们对红军的传说神了！说他们走道象飞，说国民党的兵遇上红军一打就完蛋。昨天传说红军离我们村还很远，谁想到今天早饭后就快要进村了。可是人们心里不托底，被国民党的兵“整”怕了，不少人都躲起来了。父亲让母亲和嫂子们也到亲戚家里去了。我和父亲、大哥留下看家。父亲让我也跟母亲走，我为了要亲眼看看红军的模样，没有走。

中午红军进了村，一个红军在村中心酒店门前，站在一块石头上和几位农民讲话，我站在人群中，仔细地观察这位红军，他中等个儿，灰色军帽上别着一枚红五星，灰军服，衣领上贴着红色领章，腰间佩带一支手枪，脚穿一双草鞋，两朵红绒棉球在鞋尖儿随着脚的移动而微颤，一张颧骨稍高的南方脸，一双明亮的眼睛，长长的头发，手叉腰，微笑着说：“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来到山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国民党不打日本，专门打自己的人。阎锡山说我们“杀人如割草”，你们看我们杀谁了？！乡亲们别怕，我们是人民子弟

兵，是你们的亲人，快把大家都请回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军，和蔼可亲的面庞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红军走后几天，从城里开来了“威武”的国民党兵。老百姓，把门都关上了，我是从大门缝里往外看的，他们向西山方向开去了（据说红军到了西山）。过了几天，国民党兵又开回来了，抓几个河南来要饭的老头，说是“共产党”，然后进城去了，把几个“共产党”都在城东门外枪毙了。其实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是演了一场戏。

红军走后，又复课了，时局动荡不安，学生思绪万千……。

夏天，在县里举行了毕业考试。几天后，从城里来了一个送报单的人，说我考试合格，给我家贺喜来了，报单贴在一进大门的正墙上，放了三声炮仗，领了父亲的赏钱走了。

我感激这所学校，两年来它不仅教给了我书本知识，而且使我学会睁开眼睛看天下，它是我走上人生之路的一个起点。

三、三块银元

本来应该去太原考中学，可是父亲不放心，所以拖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去太原。当时我二哥在太原兵工厂当工人，还有一个本家叔叔在水压机械厂当主任。父亲把他们地址告诉了我，万一有事可找他们帮助。临行，父亲给了我七块大洋作盘费。

到了太原，为了省钱，住在赵城会馆，见到几位同班同学。第一次进大城市，心情很兴奋，住的都是同县人，且有同学，因而也没有感到寂寞。馆里没有伙食，只好到附近开花市去吃老豆腐和切糕。在这儿，我第一次看电影《夜半歌声》，第一次听收音机，第一次看见一个警察在街上打一个黄包车夫，一个老人领

着一个小姑娘在海子边卖唱，一群人在围着海子边看警察打捞一个投湖的女人……。

在太原考上了新民中学，心里非常高兴。由于我的口袋里钱不多，不敢买东西，那儿也不去，整天呆在会馆里等待开学。

7月7日早饭后，门口卖报的大声叫喊“买报、买报来，号外，请看号外……”买报一看，日本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侵入华北，阴谋占领全中国。大家心里十分不安，但也有人抱有幻想，认为大仗也许打不起来。可是，事与愿违，每天听到的消息是，日本军天天向我们进攻，今天占了这儿，明天又占了那儿，中国的军队，看样子是抵挡不住，心更慌了。

一天上午，我到海子边去逛，见一群人在围观，我也好奇地走过去，原来是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青年女子，女子坐在行李上哭泣，男青年向人们诉说着：他们是兄妹二人，老家住在河北宛平县，日本军占领后，杀人放火，兄妹二人逃难到此，举目无亲……。围观的人们有的同情哭泣，有的表示愤怒，也有的慷慨解囊相助。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战争继续扩大，日本鬼子的野蛮暴行，不时传来，太原市面上也出现了混乱不安，会馆里的笑声消失了，学校能不能开学都没有把握，同学们在议论着，大家在想自己该怎么办？

我只有找叔叔和二哥了，叔叔当然比我们这些刚出门的毛孩子有见识，请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予我帮助、指点，可以说他们是我行动的决策人。按着父亲告诉的地点，找到了叔父家。见到了叔父和婶母，我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回家，还是留在太原等开学？请叔叔帮我拿个主意，看怎么办好。”叔叔说：“我看你还是回家去吧，现在的局势很难说……”我又到兵工厂找到

二哥，告诉他我回家的事情，他眨了眨眼睛说：“这仗还不知打到哪一年、哪一月呢？你回家吧。”以后，我又去学校探问情况，墙上有张校方的通告说：因时局关系，开学日期难定，等决定后，由学校再通知各位同学。摆在我面前只有回家一条路了。回到会馆后又有人说：市面上人们有些紧张，往南走的人很多，要走就得快买火车票，往后怕买不上了。于是，我跑到火车站买票。

回到家乡之后，待了不久，便接到了新民中学的通知：校址迁到赵城东不远的一座古老的大庙里和开学的日期。日本军离赵城还远，所以这里的人暂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可怕，农村仍旧是一片生产景象。学校的校长是赵城人，根据各方面的考虑，学校迁移到了赵城。当然我非常高兴，新迁的校址离我的家并不远，至多十几里路。

这是一座古老而宽敞的大庙，院内松柏长青，显得肃穆而又寂静，是一个清心寡欲，专心攻读的好地方。同学来了不少，有赵城县内的学生，外县学生占多数。

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们每天都听到前线失利的消息。校方天天上课，而我们的心却天天被那些不幸的消息折磨着。晚饭后，同学们依在古松旁，三三两两，在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是的，我们之中本没有一个东北人，更没有谁见过松花江，可是，那儿被日寇欺凌残害的三千万父老兄弟姊妹的苦境，怎能不牵动同是炎皇子孙的心啊！而今，这苦难的命运，是否又要降临到这里的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的头上啊！愤怒的火焰燃烧着我们这群青年人们的心！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